*本文系 2023—2024 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图书馆‘阅读推广+’学科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LTB202318）研究成果之一。

公共物品“还原”“重构”全民阅读观：内涵、方法及路径

——从学术史上“空谈误国”与“实干兴邦”两种阅读推广观谈起*

徐 凯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本文以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实践-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为基点，力倡“行胜于言”“习胜于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的全民阅读观，摒弃历史上为读书而读书、争做两脚书橱不能将知识转化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形而上的机械主义阅读，并号召专家学者进一步细化“阅读”的分类、含义及特点，科学有效地区分“文”（书写）与“献”（语言）两大载体文献的应用与推广。以期通过专业化推广机制，为读者提供符合其学科背景、阅读需求、心理特点的个性化“专属书单”，并引导其如何进行理论联系实际和超功利性阅读，将全民阅读真正落实到读者的安全、有效、持续、健康的阅读轨道上来。

关键词：全民阅读　实用主义　空谈误国　健康阅读　文献并重　新目录学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goods reading for all: connotation, Method and path

——From the academic history, “Empty talk misleads the country” and “Practical work Xingbang” two kinds of reading promotion views

Xu Kai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pragmatism” educational concept of Yan Yuan, a scholar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advocates a Marxist view of reading for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theory of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d “XI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to abandon the history of reading for the sake of reading, the two-legged bookcase can not be transformed into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s metaphysical mechanistic reading, and call on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further refine the classification,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ading”,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writing) and “Contribution” (language) two major carrier of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 readers with a personalized “Exclusive book list”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ir subject background, reading need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ing them in how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super-utilitarian reading, the reading of the whole people will be carried out to readers' safe, effective, sustained and healthy reading track.

Key Words: reading for all, pragmatism, empty talk, health reading, equal emphasis on literature, new bibliography

1 写作缘起

“全民阅读”连续十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深入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阅读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承，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启迪与推动，毋庸置疑。这是从动机论和目的论角度视之，在出发点和目标引领的基础上，最重要的就是方法手段的选择以及落实结果的评价与检验。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动机传递过程中的方法论检验。

笔者认为，全民阅读在倡导和深入过程中，在宣传推广进程中，需要先把国家所提出的这个“阅读”含义给弄懂、参透、搞清，看看哪些“阅读”是“全民”需要的、是对国民生活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哪些“阅读”是“全民”把握不好、容易产生副作用的。近日，国际图联发布了最新“数字公共物品”的简报，界定了图书馆与数字化公共物品的相关性。而其中“公共物品”的概念乃是指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东西”（引自 e 线图情 2023 年 5 月 10 日微平台）。我们知道全民阅读所指向的“阅读对象”和“阅读载体”即指“公共物品”（包括数字化产品）的推广和应用，所以作为新时代的阅读推广人首先应该对其推广的活动产品

（公共物品）进行论证与检验，核查好是否属于“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东西”，再进行科学有效的推广。俗话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始终坚守和秉持的工作作风，那么就请我们的专家学者、推广从业者放低身段、虚空认识，把对现有的全民阅读观重新“还原”再“重构”一番，看看中国古以有之的阅读观和推广经验，给了我们哪些重要启示和方法借鉴。

2 我国古代阅读观的核心价值

2.1 “择善从之”才能“明心启智”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曾说过：“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为我们点出了读书启智明心的作用。古人很聪明，善于思考，一语中的，细参这些比喻，智慧便从这里生出。很多人仅看到了其中肯定性话语的一面，单向度地认为读书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实不尽然。刘氏的话说得很有分寸，“善读”可以“医愚”，当然其中也包含“不善读”可能产生的后果。

如何“善读”？何谓“善读”？“不善”又有什么后遗症？这些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那么这个“读”，就是我们所单纯认为的“看”吗？另外，既然是“药”，大家怎么能直接认为就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呢？药也分良药和毒药，也分剂量、比例、配方、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当然药本无“好坏”，关键还是“对症下药”，就推广而言，如何“善读”才是“对症”和关键！

2.2 “读而不行”实则“误国误民”

先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载录清代学者颜元和李塨的几段话，让我们看看盲目苦读、不善方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颜元在其著作《存学编》中曾说：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1]

大家仔细颜氏的辨证思想，且不可误读为“不读书论”，其前提条件为读书应重“习行”，“知”是“行”的“知”，“行”是“知”的“行”。践行、实习、应用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行”时“知”必在，“知”时“行”已开！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知行合一”。所以给我们推广的建议是，在宣传、引导读者时，注重对其“实践应用”的规划和指导，不可只将书目丢给读者去自修、自学，做成了典型的“发传单式”的阅读推广。应该在“阅读”和“实践”中架起一座行

稳致远的桥梁，并传递给读者这样的“温馨小贴士”：如果你的阅读是可操作、可践行、可落地的，并且是行胜于言的，那么恭喜你，这波操作可以继续进行；如果你企图通过“大量阅读”而做一个“博学于文”的人，而不打算做任何“身体力行”的尝试和应用，那么作为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阅读推广人，会对你作出十足地劝诫和提示，因为即使是“真理”，它也是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也就是说就算书中的话说得再对、再有智慧和道理，也需要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当下的判断和调整，而不是拿来就用，所以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光读书不如不读。

颜元先生早就说过，如果“博学于文”的“文”只是指“文章”的话，在四书五经还没有之前，那些治天下的圣人们岂不都是“鄙陋无学”之人？可见把“博学”简化成“广泛阅读”“开坛设讲”“著述富弘”，实在是人们的浅见、拙见、断见，这些道理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都有详尽地论述，“读书即学问”这样的论断已经不消批驳了。我们诚然不要夸大“读书”的作用，安心地把它当做一个好习惯就好了，如果想通过读书即获得某种超强的能力或飞跃的目的，须知它绝不是从 A 到 B 的“因果联系”或“顺承关系”，传说中的孔子删定六经，用颜元的观点也是孔子“道不行”“政不行”退而求其次、再其次的“补救”方法。著书立说、博览群书、高谈快论并不是“改造我们学习”的最上之策，更不是“唯一法则”，当然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即使是“博览”也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否则劳而无获、终身误。

接下来听听李塨是怎么说的：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2]

这番话说得非常犀利，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迪。纸上谈兵、谈玄说地、掉书袋式的阅读我们是坚决杜绝的，大家也不用追求、不用羡慕，误国误民的方式方法绝不是我们追求的“全民阅读”，在这一点上不把国策中的“阅读”严格界定一番，想必一定会令人“寝食不安”，有前车之鉴，我们更要仔细反省、商讨对策。宋明时的读书氛围、深度广度想来不比当今差，当然当时肯定做不到“全民阅读”，老百姓们绝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才有识文断字的机会，《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还不会写字哩，排除这些时代局限，我相信大家

不会对颜元先生这番话没有“感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才是“全民阅读”寄予我们的“厚望”。希望大家不要误解颜元的言辞，他绝不是反对读书，而是“纯积极地提醒”，是叫人们“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做学问”[3]。

这些论断并不是今人才意识到的，对读书的误解和不当操作之反思和劝诫古已有之，以王阳明为核心的“心学”派和佛教禅宗对“文字障”“学术误人”等现象都做过大量精辟地阐释，兹不赘述，仅摘数语，献于同仁共品读之，以期给读者一个全面、科学、安心的推广策略与体系。颜元先生说道：

尽世圣道之亡，多因心内惺觉、口中讲说、纸上议论三者之间见道，而身世乃不见道，学堂辄称书院，或曰讲堂，皆倚《论语》“学之不讲”一句为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千里矣。[4]

且看末语“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顺序不同、境界迥然。古之学者以毕生之学结集成书，以传后世，是为“以学问为书”；今之学者一年两年便硕果累累、成文成书、连篇累牍，把写书当成学问，急功是害己，畅销则又害世。著述跟学问与成就之间的关系，我们兹不深谈，就本文之论述，实是希望读者、推广人、决策者能了解“不当阅读”或“为读而读”的现象如不根除，则是必将成为全民阅读的“拦路虎”，我们给出的建议便是梁启超先生总结的这一段话：

总之，习斋（引者注：颜元）学风，只是教人多做事，少讲话，多务实际，少谈原理。他说：“宋儒如得一路成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芜榛矣。”又说：“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以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人也。”又说：“专说话的人，便说许多尧舜话，终无用。即如说糟粕无救于饥渴，说稻粱鱼肉亦无救于饥渴也。”[5]

这些话用在我们热情洋溢的读者身上，亦有醍醐灌顶之功效，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只负责推广，大家有自己的辨别能力和选择，阅读是私人、私密的事情，无须赘言。此等语作为传统图书馆的中介性时代或是传统书店、报亭尚可有一二可取之处，亦不尽然，而如今进入到如此“侵入化”“嵌入性”推广时代，推广人既然做了营销和宣传，就得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适用性做以考察、检测和说明。如果我们的推广只是叫读者“读经典书”“说尧舜话”“充

知识有文化”，也不提醒他们阅读是为了实践、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不提醒他们读一日书就少一日社会实践、抄一篇文章就费一次体验自然这些显而易见、不易察觉的道理，都一门心思把大众往“故纸堆”里拽，这不是重蹈宋代之覆辙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民阅读怎么可以不知这些，而一门心思大踏步推广呢？把这些历史上有害的读书陋习和学术病灶都拎出来，给读者们看看、讲讲，提提醒、提提纯，使之成为健康科学的全民阅读观并纳入到“公共物品”这一经过检疫的范畴中再进入大众视野，笔者认为才是全民阅读专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2.3 破“文字障”　做“明白人”

别以为“开卷必有益”，若盲目地读、不讲方法地读，以文字为终极目标地读，请看看其结果将人会置于何地？仍以颜元的阅读观为例：

“他以为专读书能令人愚，能令人弱。……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曾说：“求文字之工，用许多工夫，费许多精神，甚可惜。”习斋（指颜元）进一步说道：“文家把许多精神费在文墨上诚可惜矣，先生辈舍生尽死，在思、读、讲、著四字上做工夫，全亡却尧舜三事六府，周礼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不肯去习，又算什么？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恕谷说：“读阅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猕猴’。世人犹谓诵读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这些话不能说他太过火，因为这些“读书人”实在把全个社会弄得糟透了。[6]

看了以上引文，看官作何感想？阅读推广是件神圣、任重的千秋大事，事关民族危亡、百姓安康，怎能说推就推、不问是非？这哪里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搪塞之词？这哪是“可有可无、或可关注”的手机新闻？这哪里是“拉杂议论、观点不明、参考价值不大”的评职演说？作为一名图书馆学研究者、阅读推广从业者怎么能忍心再让读者糊里糊涂去一门心思皓首穷经去“苦读”？颜元已耗尽心力发出了时代最强音，振臂高呼“见习为贵、愚读有毒”，请诸位阅读推广人务必体之察之，不可轻率、略过！

颜元以自身治学之切肤体验为大家讲述“善读”与“愚读”之区别，并把只

管闷头读书、不做调查研究的阅读比作服用砒霜，其说道：

仆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余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但于途次闻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7】

以上引文世人不可做“疯人疯语”看，其中丘壑必深察之。孔子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依然是“行胜于言”。学以致用、通经致用、实用理性是中华文化心理的母题，是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怎么能“空怀凌云万丈志”“百年多病独登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般被缚于故纸而不转识成智、立德树人呢？请推广人亲之、信之、思之、察之。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是不知道这些“阅读副作用”的，因为有谁会想到别人会推广一款“问题产品”给我“试用”呢？虽说“不知者不怪”，但此时已知，可有“视而不见”之理？

3 古代文与献的“分”与“合”及其功能特点

3.1 推广资源（文）与推广人员（献）的“辩证统一”

当然我们不是来拆“阅读推广”的台，我们是来检修“阅读推广”搭的这个台子根基牢不牢、质地硬不硬、质感好不好？

我们说推广阅读，促进阅读，其载体我们称之为“文献”。而有待为全民而推广的这部分“文献”，必须是进入“公共物品”范畴，才能进入流通推广环节，这本文的立意、也是全民阅读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就让我们对“文献”一词的汉字来源及其演变、内涵进行一下考辨，看看对今天的阅读观和推广专业化能有哪些借鉴意义？

“文献”一词，现存的古书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8】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道：“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徵，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其中，献，指贤才，也就是指

那些博学多识的人（当然也要有美德）。[9]

根据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介绍，下面转引大意略述之：

元代的马端临就专门有一本书叫《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有所谓《三通》，都是我们查考古代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的经典著作，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其中，《通考》在《序》里就提到了，文，典籍也；献，贤者也。又说：“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所谓“文”，即指这些。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六经》和《十七史》。历代《会要》是讲求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如《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还有后人补集的《两汉会要》等。所谓《会要》，就是以某一朝代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为主要收辑内容的一种史书。用于弥补正史的不足。除了《会要》，然后及于百家传记之书。此皆所谓“文”。

凡马氏书之记载，主要根据这些材料。在记载之外，还附带有评论，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此即所谓“献”。每项制度，以及每一种措施，在当时实际从政的人，他们所有意见，则都见之奏疏。我们当知，每一时代所发生的事儿，固甚重要；而每一时代对于此等事所发生之意见，亦同样重要。只是后人对前代事所发生之评论，不仅著在文章，亦有燕闲间之谈论，而记录在各种小说笔记上的。此等皆所谓“献”。所以“文”与“献”是两件事。“文”是指书本，“献”是指人物。

我们当知，做学问，书本固重要，人物也重要；或许人物要重要过书本。我经常告知一些学生，读书要一部一部书地读，并要读到这部书背后写书的这个人。这个人比这部书，我们更应该要注意到。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不光指写书、编书的作者，在我们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别人读这部书的，我们更要注意到。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书本的人物，才是一位鲜活的生命。是活的人借由这部死的书而传下去。[10]

对于读者而言，“文”和“献”要有所区分，有所侧重，找到阅读的方法，围绕一部典籍、一个人物的“献”级著作穿成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地读，这样才能产生兴趣、不断深化自己对某个知识、某种文化的了解，达到孔子“学而时习之”的境界，循循善诱、日有寸进，才是进入终身学习的一种途径；对图书

馆而言，在数智时代，纸电资源是“文”，人才资源是“献”，全民阅读不仅需要“阅读载体”的“公共物品”性（即对整个社会有益性），这是我们所推崇的“文”，还要帮助读者树立“阅读与实践相协调、科学与人文相协调、实用与审美相协调”的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全民阅读观，更要帮读者学会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抓住书背后的那个撰写者的人格、气质、处事与时代，并以此为出发点将历史上阅读过这部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一个作者、一个学派、一种思潮的思想图谱和精神坐标，从而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考察和运用作为“（数字）公共物品”进入大众视野的这部分文献来推广和丰富读者的阅读方法和审美体验。

3.2 深刻把握阅读过该文献的“读者”与“时代”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继续论述道：

在我们一所大学里面，要研究学术，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图书馆，要藏有很多的书，这即是“文”。又一定要合理想的、标准的教授，这就是“献”。学问学问，要自己学，还要学会问。无此两项，便是文献不足。举个例子，如诸位要研究孔子的道理，当然要读《论语》，《论语》就是“文”。或者读《春秋》，《春秋》也是“文”。但仅此还不够。尚有如左丘明、孟子，这许多人就是贤者，就是“献”。要兼此二者，才能懂得《论语》和《春秋》。我们若要学和查孔子的诸多道理，读《论语》，便该连带去问问孟子。读《春秋》，也应该连带去问问左丘明。所以“文”与“献”该相提并论，两面俱到。若使我们说这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又说这是读死书、死读书、书读死，不成学问。但若你碰到了一个大贤，得他指导，你就知在这故纸堆、工具书中，藏有精深的涵义，死工具就变成了活学问，只要有人能讲。即使有一天你们出国留学了，去研究汉学，在他们那里，所藏中国书很多。但仅此是一堆书而已。有书而，有“文”而“献”不足，倒还是读死书，所以要学会运用用活工具书。

所以，我们说如果诸位要研究孔子，便该从先秦孟子、荀子一路下来，历汉唐到宋、元、明，直到清代，从来研究孔子的人有多少？这许多人所讲也即都是“献”。但积久了，所谓“献”的，也都成了“文”。在我们现代，又要找一个也能像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一样能讲孔孟之道的，那就不容易了。所以尽说又传统文化，我们还得要一个活的“献”，那才是真传统。仅在图书馆求是不

够的。图书馆终究不是一个活东西，要有人物，要有学者，要有了“献”，那“文”才都发挥光华，都见精彩了。[11]

钱穆先生是位历史学家，在读书、治学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很多读书法、思考和见识都有很强的启发性。如上所述，对“文”与“献”的区分及应用可谓鞭辟入里，对于我们阅读《论语》类的经典文献给出了“教科书级”的推广范式。所以，我们非常提倡加强阅读推广人队伍的建设和完善，一方面要切实把钱穆先生提到的这些“献级”人物从各行各业吸纳进来，帮助他们从教授、作家、媒体人、社会活动家、艺术家的职业和身份中转变成具有系统推广精神的“阅读推广人”，手把手、心连心、全方位、可操作性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广给读者，把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阅读兴趣和性情所在，建立自己的“阅读库”，找到“自我发现”的密码。这也是健康、科学的全民阅读观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拥有了会筛选“（数字）公共物品”、会知行合一式阅读的、懂文献并重的阅读推广专业化团队，才能将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推广落到实处、不起副作用。

4 新目录学建设赋能阅读推广

基于以上两部的论述，我们了解了“阅读也有副作用”“行胜于文才健康”以及“人才资源建设是第一生产”，接下来我们用简短的话语来勾勒出阅读推广科学引领体系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即在数智时代以新目录学为推广起点的智能化独享专属推广阅读方法。

通过大量的实践我们发现，很多城市公共馆、城市书房用田野调查法、专家推荐法、大数据分析法遴选出厚厚一册子的推荐书目，杂门傍类、畅销经典一锅粥，大家捧在手中，心生愧色，看名称就“难以下咽”，自称“才疏学浅”，不看“心生不安”，看了“举步维艰”，这不能单纯地从道德层面和学识层面对读者进行“主观臆断”。鉴于此，我们借用新目录学（柯平教授曾提出的）的方法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也就是“阅读”也需要一些步骤和程序，你的思维和知识积累要跟所推广的书“兼容”，才有可能“接通”书中内容。反过来说，也就是传统的推广书单自身就未成体系，就没有考虑到受众的知识、阅历、学识等“接口”在哪，自身就很散乱，又没有“转换器接口”，又没有设置科学的“提取码”，让市民自己去“填空”，这种推广就太“精英化”“本位化”“形式化”了。

清代著名的经史学家、考据学家王鸣盛先生，他在《十七史商榷》中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12]另一位是南宋的史学家、校雠学家郑樵，字渔仲，他非常深刻、颇有见地、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图书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13]“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14]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两条宝贵的经验，第一是做学问不专注、不专心、不专业有时候不光是我们不够勤奋、不够聪敏、不够坚韧等原因，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大关键、大过节，就是对所关注和研究领域之书和书的分类、系统、脉络、全貌不够了解和熟识，盲人摸象，孤海泅游，无头苍蝇，不得要领所致。

第二点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机地掌握特定领域的书目概况和历史沿革的话，也很难成绩斐然、有所成就，因为别人有前人铺好的高速公路、轻轨快轨，你是单枪匹马、投石问路，所以我们治学，要特别注重源流和沿袭两大方面，这乃是工具书类文献给我们的宝藏和福利。人有大限，学无止境，世有更迭，书香绵长。

还有一位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由于不是每个人都有幸遇到良师，所以有的学者往往有这样一个学术传统，就是向初学者推荐一些导读书目。比如张之洞就极力推荐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他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15]“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16]

做学问跟一般阅读相通，如此精通读书的学者治学都须“得门而入”，那对于一般读者来讲，方式、方法、路径、轨迹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力倡导专家学者“礼贤下士”“放低身段”“集思广益”、把不同读者阅读需求的门径都找到，并规划出进阶式阅读的系统，跟踪服务，变嵌入式服务为一站式服务，实现阅读推广引导机制的科学化、体系化、学科化发展。

5 结语

归根结底，只有把我们的“阅读”融入到学习、生活、生产实践中，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才是我们积极倡导的健康的“全民阅读”。对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消磨式、功利式、沉溺式阅读，其消极因

素弊大于利，作为阅读推广人也是不得不跟读者讲清楚的。至于，很多读者比较关心的“为什么大家推荐的经典书我就是读不懂、读不下去”的问题，跟推广方式、推广机制、推广系统性不强有强相关性。杜绝“菜单式”“传单式”“订单式”推广，帮助读者找到门径、路径、半径，筑好台阶、画好路标、安好导航，行之有效地对全民进行阅读指导与科学实践，才算是尽到了推广人的“本分”、抵达了图书馆人的“良知”、体现了信息素养人的“操守”，从而达到笔者曾撰诗憧憬之境：

阅经据典词中仙，读史读人义薄天。
推己及君德尚玉，广交贤士业修轩。
传儒溯道多情苦，承嬗离合无欲闲。
创见诗情琴瑟美，新茶书卷润心田。

参考文献：

[1][2][3][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人民出版社，2008（12）：128.

[5][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人民出版社，2008（12）：126.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人民出版社，2008（12）：127.

[8]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58.

[9]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中华书局，2008（1）：2.

[10][1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九州出版社，2012.

[12][13][1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中华书局，2007.

[15][16]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M].齐鲁书社，1998.

本文作者：徐凯，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中级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小说，阅读推广。通信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850号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13478607633　著有《阅读推广+：理论与实务》（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